

厦 门 大 学 海 外 教 育 学 院
海 外 华 文 教 育 研 究 系 列

华夏之光：

跨文化、跨时代与跨学科探索

黄鸣奋 / 著



HUAXIA ZHIGUANG
KUAWENHUA
KUASHIDAI
YU KUAXUEKE TANSUO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黄鸣奋 / 著

华夏之光：跨文化、跨时代与跨学科探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夏之光:跨文化、跨时代与跨学科探索/黄鸣奋著. — 厦
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11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海外华文教育研究系列)

ISBN 7-5615-2680-6

I. 华… II. 黄…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②汉
学-文集③文艺理论-文集 IV. ①I0-53②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4656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昕嘉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34千字 印数:0 001-1 500册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 序

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肩负着向世界传播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光荣使命。当前的世界格局为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和应用价值也不断提高。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现在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需要汉语和汉语人才。

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发展呼唤我们对外汉语教师和华文教育工作者、研究者为其提供系统、科学、富有生机的理论研究成果,要求我们从海外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所在国的国情出发,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编写出适合海外学生的富有特色的汉语与中华文化教材。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作为国家汉办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院校和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在近半个世纪的海外中文远程教育和对外汉语教学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我院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我们特组织在教学第一线的老师编写了一套“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丛书”和一套“海外华文教育系列教材”。研究丛书力求以宽阔的视野和深入的思考,努力探索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系列教材力求较为系统地介绍海外学生应该掌握和了解的汉语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努力做到通俗易懂、简

明扼要、实用性强。

我们衷心希望研究丛书和系列教材的出版,能为对外汉语教学和华文教育事业添上一砖一瓦,同时也希望有关专家、学者以及使用者、学习者都能不吝赐教,以期将来进一步修改提高。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是教育部批准设立的首批对外汉语教学基地之一。学院自1980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为办学宗旨,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不断探索和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体系。学院下设多个系、部,开设了多门对外汉语专业课程,培养了大批优秀毕业生。学院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学院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未来,学院将继续秉承优良传统,深化改革,创新发展,为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自序

我对中华文化的热爱，要追溯到孩提时期。我出生在福建安溪官桥，父亲是从南安县到当地工作的中学语文教师。母亲在我不满周岁时即因患胃癌逝世，遗愿是让我长大之后行医。在父子俩相依为命的那些年里，对着油灯吟诵古典诗词、朗读散文名篇，成了父亲对我进行启蒙教育的主要方式。严父课读，本意是为了提高我的语文水平。但他很快就发现：我不需要督促就自觉向中学生哥哥姐姐们求教，自行到中学图书馆借书（至今我仍感谢管理人员的理解与支持），甚至把难得有的零花钱都用于买书。回忆起来，驱使自己这样做的动因，开始是寂寞，继之是对连环画、通俗读物乃至四大名著所展现的大千世界的好奇，其后则是发自内心的求知欲。每天晚上，父亲看着我睡下才离开；他一走，我又起身点灯，就着黄豆大的灯焰看起书来。直到后来邻居“告状”，父亲才知道此事。由于父亲续弦、养母居于厦门的缘故，我在1962年底从安溪湖头中心小学到了厦门第四中心小学就读，并于次年考入厦门双十中学。在整个中小学阶段，语文老师换了一任又一任。他们尽管有着不同的性格和修养，但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63年初我在操场上摔倒时，董白丁老师亲自为我吮吸额头的淤血；1965年夏我寄宿于双十中学时先后得过白喉和麻疹，陈光验老师亲自背我上医院……此情此景至今仍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些老师仿佛就是中华文化的人格化身，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精神种子。

小学阶段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盛产铁观音的山区。转学来到厦

门之后，使我惊讶的主要不是厦门人喝的“功夫茶”如此之讲究、浓到我几乎不敢问津，而是同学中颇有些技术高手。他们居然能够装配出航模、电子管收音机之类玩艺儿，让我自愧不如。另一个刺激是城里的学生很早就有参加各种级别的正式竞技的机会，老师也经常用“运动员”这类头衔来诱惑我们。由于过早上学、山区照明条件又差的缘故，我很小就高度近视，在运动场上绝不是同学的对手。此时来了好机会：厦门国防体育俱乐部开设无线电报务训练班。我知道这一行居然也出“运动健将”之后，便趋之若鹜，将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嘀嘀哒”中。学龄期友伴的影响经常胜于师长和家长的期待。在参加业余无线电兴趣小组、结交了一批“收音机迷”之后，我在中文方面所花费的时间相对减少了。临近初中毕业时，我甚至设想过不念普通高中而直接报考电工类中专。正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和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一样，我被迫中断了学业。在经历了短暂的政治狂热之后，我回到家中一心打造天线、地线，单单有关无线电技术的笔记就写了十几本。如果套用精神分析学派惯用术语，可以说我在幼时的习医情结之外又多了个理工情结。在动乱时期，我自学了高中的数理化乃至大学一年级的部分课程，并装配了一台又一台收音机，但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长进。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由于身体条件报考理工科受限，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汉语言文学，尽管家里人认为这不是最适合我的专业。进入厦门大学之后，我第一次知道除理工科之外，文科居然也有科研。当时，厦门大学中文系举行校庆科学讨论会，令我们大开眼界。作为本科生，我只在《福建青年》、《中国青年》这类刊物上发表过一些小文章。真正的科研活动是从研究生阶段开始的。我所在的专业1982年只招收了两个学生，其中有一位很快移民美国，于是就形成了几位导师联合培养一个学生的格局。导师们对我非常关爱，同时又相当“放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童年的习医

情结之一开始起作用，将学术研究扭向文艺心理学方向，因为它似乎和医学比较贴近。这样，我写出了长达 20 余万字的硕士论文《论苏轼的文艺心理观》(删节后于 1987 年正式出版)，并在留校执教后长期从事有关需要理论的研究。

我认定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文艺心理思想，并想致力于发掘这一宝藏。名家鲁枢元先生邀请我到郑州大学开会(1986)，并希望我撰写《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史》。这无疑是良机。在黄河边散步时，鲁先生问我：“你写这本书，将以什么为参考系？”我明白他指的是西方哪个流派的理论，但犹豫了一会，居然这样回答：“以自己的理论。”这样说或许有原因，那就是我当时已经在撰写后来以《艺术交往心理学》(1987)、《艺术交往论》(1993)为名出版的书稿。但 1988 年到荷兰访学的经历，使我感受到在心理学领域自己的知识积累与西方同行相比的差距。因此，我拖了很久，没有动笔写《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史》。后来原先将该书列入计划的出版社变动，此事也就不了了之，这是我至今仍愧对鲁先生之处。

1993 年到荷兰莱顿大学当访问学者时，我接触了计算机与互联网。在出了几次洋相(包括误删 DOS 系统的启动文件之后)，我发现了 IT 魅力实在难以抵挡：友人褚真威居然可以从莱顿大学调用美国国会图书馆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信息，帮助我了解中国古典文学的著译情况！真不可思议。从此，童年的另一个情结强有力地支配了我的学术活动。归国以后，我很快投身于有关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在文艺领域之应用的研究。国外友人曾问我：“厦门大学何时用上互联网？”我说：“十年算不错了。”事实证明：我的估计太过保守。不到三五年，厦门大学就实现了与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我所住的海滨东区不久也成了信息化示范小区。IT 不仅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且给包括中文在内的各个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往日“背起书包上学堂”的小儿郎，如今揣手机、带 U 盘、玩网游，大学生更是纷纷自购电脑、建网站，在网

络世界挥斥方遒。这种变化顺理成章地成为我的研究课题，并鞭策我“活到老，学到老”。对我个人来说，有关著作既是前瞻——缔结文学研究与IT之姻缘，也是怀旧——圆我少年时代未了的科技梦。

上文讲述的或许只是我个人的经历，但也可能具备某种普遍意义。作为中国人，我们完全可以为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自豪。尽管如此，在当今世界上，我们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挑战，有必要吸收国外现代化进程所积累的经验，借鉴它们的成果，在博采百家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创造。

在学术生涯中，我将大部分时间用在写书上（参见附录），虽然所发表的学术文章已经有200多篇，但其中大部分是由学术专著切分出来的。为了避免重复，本书所收录的是相对独立于学术专著之外的论文，分为三组：

一是中华文化的本体研究。研究生阶段我所攻读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古代文论研究应坚持历史性原则》（1983）、《应当重视古代文论范畴的宏观研究》（1985）体现了自己对于我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思考。由于自己的兴趣向文艺心理学转移，其后发表的《刘克庄诗论辨析》（1987）、《刘勰的艺术交往观与〈文心雕龙〉之意脉》（1987）、《穷者诗乃工》（1996）、《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禅法与艺术构思理论》（1999）都打上了相应的烙印。中华文化内部的传播活动，在我看来也属于本体研究范围。《我国古代军事传播刍论》（2005）、《媒体、社会与心理：古今两次重大变革》（2005）是应我校人文学院新闻系的要求撰写的，因他们正想推进华夏传播研究。《文法与兵法》（2006）具有跨学科比较文论的取向，但内容仍属于中华文化本体研究。《郑朝宗与钱学》（2000）则是对先师的纪念。

二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播研究。我两次到荷兰访学，主要成果是《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专著，1997）。它着眼于文体，

分门别类探讨了我国古代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论与工具书在海外的影响,全书各章节几乎都已单独发表。除此之外,我还撰写了一些着眼于传播者身份(个体或群体)的论文,收入本书的有《美国华人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论文通考》(1994)、《美国高校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论文巡礼》(1995),以及《哈佛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95)、《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96)、《悉尼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1997),以及《英语世界受青睐的中国古代女诗人》(1997)。从2004年11月起,我兼任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之职。由于新岗位的需要,我撰写了与海外华文教育有关的一组文章,即收入本书的《世纪回眸:从华语到世界汉语——人民日报(1946—2000)相关用语分析》、《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培训国外汉语教师》、《风险与机遇: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态势》、《美国 AP 项目:中文教学的跨层次衔接与跨文化交流》(2005),以及《硅谷之都:圣荷西中国文化研究与汉语教学一瞥》、《民族语言世界推广概述》(2006)。

三是对中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当代信息科技对于中华文化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双重的。它既解构了传统的模式,又开创了崭新的天地。《危机与际遇:电脑时代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1998)、《女娲、维纳斯,抑或魔鬼终结者?》(2000)、《新理性精神:面对信息科技的沉思》(2003)都反映了自己对上述双重作用的思考。20世纪末以来,由于信息科技的推动,网络文学在我国大行其道,《网络时代的世界华文文学》(2000)、《网络文学之我见》(2001)、《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网络文学研究》(2004)、《文学写作:从原点到极境》(2004)、《从网络文学到网际艺术:世纪之交的走向》(2005)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自己对这种新型文学的看法。摄影文学、DV 艺术在我国的勃兴,一方面受“读图时代”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热心人促成的缘故。为其热情所感染,我撰写了《互文性:摄影文学的精髓》(2001)、《编码系统中的摄影文学》(2003)、《化瞬间为永恒,融永恒

入瞬间》、《舒展方寸地，逍遥瞬息间》(2005)等文章。至于我个人比较独特的关注重点，则出现在《网络艺术：世纪之交的学术热点》(2000)一文中。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网络艺术创作与研究存在很大的差距。此文包含了对国内创作者与研究者的殷切期待。

收入本书的论文，绝大多数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此次汇编成集，仅作了文字上的校订，并补齐了提要。

中华文化以开阔的胸怀面对世界，因此保证了自身发展的延续性，并始终保有继往开来的活力。作为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我们承担着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之了解的任务。我们不仅必须具备一般意义上语文教师的素质，而且要有外语功底、IT技能、全球眼光。目前，国家已经将向世界推广汉语作为长期战略，我们任重道远，正当自强不息。选编这本个人论文集，为的就是这一目的。期待读者的指教。

黄鸣奋

2006年4月2日

目 录

总序	1
自序	(1)

第一编 跨时代的求索

古代文论研究应坚持历史性原则	(3)
应当重视古代文论范畴的宏观研究	(8)
严羽、刘克庄诗论辨析	(18)
刘勰的艺术交往观与《文心雕龙》之意脉	(36)
穷者诗乃工	(47)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禅法与艺术构思理论	(60)
郑朝宗与钱学	(75)
我国古代军事传播刍论	(85)
媒体、社会与心理:古今两次重大变革	
——关于传播学本土化及华夏传播史的思考	(98)
论以兵喻文	(108)

第二编 跨文化的探索

美国华人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论文通考	(133)
美国高校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论文巡礼	(146)
哈佛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151)
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166)

悉尼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	(177)
受英语世界青睐的中国古代女诗人·····	(187)
世纪回眸:从华语到世界汉语	
——《人民日报》(1946—2000)相关用语分析·····	(195)
充分发挥网络优势 培训国外汉语教师·····	(219)
风险与机遇:当前印尼华文教育的态势·····	(227)
美国 AP 项目:中文教学的跨层次衔接与跨文化交流·····	(242)
硅谷之都:圣荷西中国文化研究与汉语教学一瞥·····	(258)
民族语言世界推广概述·····	(271)

第三编 跨学科的思索

危机与际遇:电脑时代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	(293)
网络艺术:世界之交的学术热点·····	(310)
女娲、维纳斯,抑或魔鬼终结者?	
——电脑、电脑艺术与电脑艺术学·····	(315)
互文性:摄影文学的精髓·····	(339)
编码系统中的摄影文学·····	(343)
新理性精神:面对信息科技的沉思·····	(347)
网络时代的世界华文文学·····	(354)
网络文学之我见·····	(357)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网络文学研究·····	(371)
文学写作:从原点到极境·····	(380)
从网络文学到网际艺术:世纪之交的走向·····	(385)
化瞬间为永恒 融永恒入瞬间	
——一分钟影像艺术论析·····	(396)
舒展方寸地 逍遥瞬息间·····	(410)
附录:黄鸣奋著作目录·····	(413)

第一编

跨时代的求索

古代文论研究应 坚持历史性原则

提要 研究古代文论既要注意其现代转换的可能性,又要坚持历史性原则,尊重古人的本意及相关理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正确评价“以古注古”、“以经注经”,避免简单化、随意化。

吴圣昔同志的《谈古代文论研究的所谓“现代化”问题》^①,是一篇富有启发性的文章,值得大家重视。该文主张:在古代文论研究中,不应当局限于阐发古人的原意,而应当“在古人论述的基础上,剔除其中包含的不科学的灰尘,加以适当的改造和发展,给以新的合乎科学的规定性”;提倡“运用现代文学理论来论述古代文论”,不囿于“以古注古”、“以经训经”,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见解。但作者在谈到“现代化”的趋势不可免、对“现代化”的指责不可要时,似乎主要把古代文论当成任人加工的思想材料,而忽略了它作为一种历史研究对象的特点。

毫无疑问,古代文论中的各种观点,都是在历史上产生、发展并发挥过一定作用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研究历史现象时,要强调“历史性”原则。所谓“历史性”,至少包括下述内容:其一,尊重古人的原意,不要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古人;其二,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考察;其三,通过追源溯流、前后比较,正确地评价古人的历史

^①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第608期。

地位。将“历史性”原则运用到古代文论研究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致力于准确地揭示古人观点的内涵（尽管其中包含着“不科学的灰尘”），进而考察古人所处的历史条件，弄清其学说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渊源，并分析它的社会效果，然后予以恰当的评价，从中求得我们今天所应借鉴的经验教训。而这一切，正是我们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论这份遗产、为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列主义文学理论服务所必须做的工作之一。倘若脱离“历史性”而把古代文论现代化，满足于“运用现代文学理论来论述古代文论”而不作历史研究，那未免把复杂的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把古代文论当成一种历史现象或者视为创立新理论所需的思想材料来加以研究，这本来是如埴簋之相和的。没有前者，古代文论即使要升华也缺乏必要的基础；没有后者，我们只能永远停留在古人的水平上，不能前进一步。详尽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前人的观点，再对它们进行加工改造，这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二者毕竟有所区别，不宜混为一谈。倘若是前者，那我们必须严格尊重历史，决不能超越古人的实际水平来加以拔高；倘若是后者，那不妨骋才运思，博采百花而构佳酿。对“现代化”的批评，恐怕不少是针对研究工作中混淆二者的区别而发的。当前，在“运用现代文学理论来论述古代文论”方面，许多同志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也存在某些值得改进的地方。例如，信手从古人著作中拈来一段话，不把它放在原作者整个思想体系中加以考察，也不结合相应的历史条件进行研究，便随意生发，这种“改造和发展”虽然省力，但能有多少价值呢？还有些同志，他们自己本来对许多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尽可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出来，写出自己的灵感论、鉴赏论、风格论等，何必硬挂在古人名下、托古以自重呢？

为了坚持“历史性”原则，有必要正确地估量“以古注古”、“以经注经”的作用。如吴圣昔同志所说，这种方法可能产生简单比附的毛病，例如以唐人所说的“情志一也”去注释先秦的“言志”说，就